《学术界》(月刊)
总第214期,2016.3
ACADEMICS
No.3 Mar. 2016

徽州私塾读本考[*]

○ 张秋婵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文法部,安徽　合肥　230022)

〔摘　要〕徽州私塾遍及井邑田野,徽州的教育者们根据自身的教育实践经验,因着培养目的不同,编著了适合徽州学童学习的塾课读本:以朱子为宗的六经传注是徽州私塾的普遍读本,名儒编写的适合童蒙习诵的小学读本为徽州私塾基础读本,以培植英才为目标的大学读本是徽州私塾的通识读本,而以治生为手段的职业教育读本在徽州私塾读本中地域性特征最显著。

〔关键词〕徽州;私塾;读本

徽州地区一直有着崇儒重道、兴学立教的传统,这里文风昌盛,名臣辈出,被誉为"文献之国""东南邹鲁","新安自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当其时,自井邑田野,以至于远山深谷,民居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1]徽州文献丰富,其中教材类尤为突出,笔者受复旦大学查屏球教授所托,最近对这类文献进行了调查,颇有收获,现将研究所得列述如下,以求方家指正。

一、以朱子为宗的六经传注是徽州私塾的普遍读本

徽州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桑梓之邦[2],新安理学在徽州蔚然成风:"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3]一些名儒于圣人之经、濂洛诸书具为传注,而他们所做的六经传注皆崇朱子之说,以朱子为宗的六经传注是徽州私塾的普遍读本。"凡六经传注,诸子百氏之书,非经朱子

作者简介:张秋婵(1963—),文学博士,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文法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安徽地域文化。

〔*〕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课题"潘之恒研究"(2009sk479zd)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是以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为然。”[4] 这些传注有宋胡方平撰《易学启蒙通释》二卷;元胡一桂撰《易本义附录纂疏》十五卷、《周易本义启蒙翼传》三卷、《外篇》一卷;元胡炳文撰《周易本义通释》十二卷;元陈栎撰《尚书集传纂疏》六卷;元汪克宽有《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三十卷、《程朱传义音考》《集传音义会通》《礼经补逸》《凡例考异》;元赵汸有《春秋集传》十五卷、《春秋属辞》十五卷、《春秋左氏传补注》十卷、《春秋金锁匙》一卷、《周易文诠》等;元倪士毅有《四书辑释》;明朱升有《周易旁注》十卷、《尚书旁注》六卷、《尚书旁训》二卷、《中庸旁注》一卷、《老子旁注》一卷、《孝经旁注》一卷、《大学旁注》一卷、《诗旁注》一卷、《书传补正辑注》一卷。清廖著有《四书体注补》四十二卷;清方逢龙有《理学枝言》;清施璜有《小学发明》《性理发明》;清王瑞仪著有《周易实证》等。

胡方平,字师鲁,号玉斋,婺源人。“方平之学出于董梦程,梦程之学出于黄榦。榦,朱子婿也。故方平及其子一桂皆笃守朱子之说,此书(《易学启蒙通释》)方平即发明朱子《易学启蒙》之旨。……方平此书虽亦专阐数学,而根据朱子之书反覆诠释。所采诸书,凡黄榦、董铢、刘爚、陈埴、蔡渊、蔡沈六家,皆朱子门人。又蔡模、徐幾、翁咏三家:模,蔡渊子;幾、咏,皆渊之门人。故所衍说尚不至如他家之竟离其宗,是亦读《启蒙》者所当考矣。”[5] 胡一桂,字庭芳,号双湖,婺源人,胡方平之子。景定甲子领乡荐,试礼部,不第,教授乡里以终。其《易本义附录纂疏》“以朱子《本义》为宗,取文集、语录之及于《易》者附之,谓之《附录》;取诸儒《易》说之于《本义》者纂之,谓之《纂疏》。其去取别裁,惟以朱子为宗。”[6] 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一桂于皇庆二年自刻《周易本义启蒙翼传》三卷、《外篇》一卷。《自序》称“去朱子才百余年,而承学渐失,如图、书已厘正矣,复仍刘牧之谬者有之;卜筮之数灼如丹青矣,复祖尚玄旨者又有之”。胡炳文,字仲虎,号云峰,婺源人,一桂子。尝为信州道一书院山长,再调兰溪州学正,不赴。其《周易本义通释》“据朱子《本义》,折衷是正,复采诸家《易》解互相发明。”[7] 陈栎,字寿翁,号定宇,休宁人。陈栎《尚书集传纂疏》“以疏通蔡《传》之意,故命曰疏,以纂辑诸家之说,故命曰纂,又以蔡《传》本出朱子指授,故第一卷特标朱子订正之目,每条之下,必以朱子之说冠于诸家之前,间附己意,则题曰‘愚谓’以别之。”[8] 自序称:“圣朝科举兴行,诸经、《四书》一是以朱子为宗,《书》宗蔡《传》固亦宜然”。汪克宽,字德辅,一字仲裕,学者称环谷先生,祁门人。祖汪华受业朱熹再传弟子双峰饶鲁,得勉斋黄氏之传。汪克宽于“圣贤之言心融神会,造诣深剧”,“其学以朱子为宗”,对诸经多有传注[9]。《春秋胡传附录纂疏》自序称:“详注诸国纪年、谥号,可究事实之悉,备列经文同异,可求圣笔之真。益以诸家之说,而裨《胡氏》之阙疑,附以《辨疑》、《权衡》,而知三传之得失。”[10] 赵汸,字子常,学者称东山先生,休宁人。赵氏“蚤岁学于乡,求程朱之余绪,诵习经训,辨释其文义之外,无所致力焉”。后学于九江黄泽,“得六经疑义千余条以归”。“复从临川虞集游,获闻吴澄之学,乃筑东山精舍,读书著述其

中”。汸“于诸经无不通贯,而尤邃于《春秋》”。[11]

二、名儒编写的适合童蒙习诵的小学读本

徽州的私塾教育有明确的层次之分,分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其教育内容和教育的着重点各不相同。从八岁到十五岁,为读小学时期,十五岁以后为读大学时期。小学阶段以教授初学儿童识字、句读、背诵为主,称蒙学或蒙馆。“盖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诚敬之实,及其长而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间,各有以知其义理之所存,而致涵养践履之功也。”[12]“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13]。小学阶段最主要的是在教会儿童识字、句读的基础上,训练儿童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灌输孝、悌、忠、信的道德理念。徽州名儒编纂了许多适合儿童学习的蒙学读本。如朱熹《童蒙须知》《易学启蒙》《小学》等;胡炳文《纯正蒙求》;陈栎《论语训蒙口义》《中庸口义》《历代蒙求》;朱升有《小四书》;明末歙人胡开著《蒙养诗教》;清吴应申撰《春秋集解读本》。

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朱熹有着丰富的儿童教育经验,他认为:“大抵诸老先生之为说,本非为童子设也,故其训诂略而义理详。初学者读之,经之文句未能自通,又当编诵诸说,问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启蒙之要。”[14]《小学》是朱熹为蒙学特意编写的读本。《小学》,旧题宋代朱熹撰,实则为朱熹与弟子刘清之合编。《小学》全书六卷,分内篇和外篇两个部分。内篇有:立教、明伦、敬身、鉴古四个纲目。外篇又分成嘉言、善行两部分。鉴古记载夏商周三代圣人贤者之迹;嘉言和善行记载汉以后贤者的嘉言善行。三个纲目中最主要的是明伦,立教的目的是为了明伦,敬身也是为了明伦。《小学》在徽州私塾蒙训教育中被普遍使用。

胡炳文仿前代《蒙求》和朱熹《小学》外篇格式,编《纯正蒙求》。“蒙求之书,先儒为诸凡数家矣。吾邑云峰胡君又集古今嘉言善行为一篇,名曰《纯正蒙求》,仿佛文公《小学》书之遗意。虽其纲不出明伦、立身、接物三者,而搜葺之力勤矣,所以为养蒙做圣之功宏矣。”[15]“《蒙求》自李瀚以下,仿其体者数家,大抵杂采经传事实,隶以韵语,以便童子之记诵。然多以对偶求工,不尽有关于法戒。炳文是书,则集古嘉言善行,各以四字属对成文,而自注其出处于下,所载皆有裨幼学之事,以视饾饤割裂,仅供口耳者,于启导较为切近。上卷叙立教明伦之事,中卷叙立身行己之事,下卷叙待人接物之事,略以《白鹿洞规》为准。每卷一百二十句,总为三百六十句。卷中又各有子目,每一目多者一二十句,少者不过四句。中间以拘于骈俪,格于声韵,故漏落甚多。又如黄香暖席宜入父子之伦,而反入幼学见趣条下;陈子高让田宜入长幼之伦,而反入处宗族条下。其分隶亦未能悉允。然养蒙之教,取其显明易晓,不贵以淹博相高。此书循讽吟哦,以资感发,与朱子《小学外篇》足相表里,固未可以浅近废也。”[16]

陈栎根据自己长期以来的教学实践,编写出一系列适合儿童特点的理学教

育读本。《论语训蒙口义》是他积三十余年教学之经验编写而成的:“栎沉酣《四书》三十年余,授徒以来,可读朱子《集注》者固授之,唯谨遇童生钝者,困于口说,乃顺本文推本意、句释,笔之其于《集注》,涵者发、演者约、略者廓,章旨必揭,务简而明。旬积月累,累以成编,袭名《论语训蒙口义》。自《集注》外,……诸儒之讲学可及者咸采之……栎一得之愚往往附见,或有发前人未发者。……抑不过施之初学,俾为读《集注》阶梯,非敢为长成之言也。”[17]《中庸口义》针对儿童的学习特点编写,“授以朱子章句或问,往往难入,不得已绀绎朱子之意而句解之,复述读此书之大略二此”。[18]陈栎还有《历代蒙求》一卷,用四字韵语的形式,简述从开天辟地到元代的历朝兴衰,每个朝代皆述其开国与亡国之君,再提及其间有作为的皇帝,简单扼要地介绍了历史的梗概,特别适合做私塾童蒙读本。

朱升为童蒙编辑过的读本有《小四书》,又名《四家蒙训》,计四种五卷,为宋方逢辰撰《名物蒙求》一卷、宋黄继善撰《史学提要》二卷、宋末元初程若庸撰《性理字训》一卷、元陈栎撰《历代蒙求》一卷。朱升认为“夫读书不可无注解,然注解与本文相离,学者若不能以意相附,则非徒无益,而适滋其惑。故愚于诸经书往往与之旁注,使学者但读本文而览其旁注,一过则了然,无繁复之劳也。今此小四书者,语约而事意多,故旁注不足,则又表注于栏上,使教者有所据依,而学者易于记忆,此区区之至意也。既脱稿,刻之斋舍,题曰《小四书》,以别晦庵《四书》云。”[19]

歙人胡渊,著《蒙养诗教》,用以“训迪童子,俾入学之年即知尊亲敬长之道与夫服劳奉养之宜”[20]。胡渊,字燊明,号匏更。“元儒胡云峰之后,性至孝,甘贫好古。明末为邑诸生,鼎革后绝意仕进,潜修实践,与同邑汪德元、汪知默、江恒辈集紫阳书院讲学,郡守曹鼎望折节下之,学者多尊师焉。”[21]《蒙养诗教》其文则浅近之文,其事则孝悌之事。有立、行、坐、笼手、拱手、肃揖、展拜、著衣、吃饭、应对、静声、敛气、寝息、出恭、洒扫、事亲、事兄、尊师、处友、见宾、读书、写字、歌诗诸篇。以“立”篇为例:“书生站立要端然,气象如山学圣贤。下莫参差跷一足,上毋斜倒侧双肩。摆摇不定应生厌,倚靠难停更可怜。立定脚跟从此始,德容古训至今传。”[22]文字浅显易懂,朗朗上口,训练儿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清吴应申撰《春秋集解读本》十二卷。应申,字文在,歙县人。“以《春秋经解》卷帙浩繁,难于遍读,因会萃众说,择其合于经旨者详著经文之下,以资记览。自序谓词可计日而诵,为愚鲁者计甚便。盖特乡塾课读之本也。”[23]

三、以培植英才为目标的大学读本

大学则与小学不同,其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是发明此事之理”。“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24];“大人之学,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是也”[25]。徽州私

塾此阶段教育具有双重功能:一是使学者明晰义理,掌握修己治人之道和治国经世之术,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二是为以科举入仕为指归的应试教育。而此时的徽州私塾读本也服务于这种精英教育。

关于大学教育的任务在施璜等人制订的《塾讲规约》中提出有九项:一曰尚道德、二曰定宗派、三曰持敬、四曰译注、五曰力行、六曰习六艺、七曰育英才、八曰务谦虚、九曰防间断。联会讲学的目的,是"愿同人立志发愤,一意从事圣贤之学,以仁为己任、以明道相砥砺、以进德相期待"。并非一意地"专以诗文相砥砺,以科举相期待"。因为"苟道明德立,未尝不可以为诗为文、为公卿大夫,即布衣不仕,亦可以为后学师表";"如道不能明、德不能立,则虽做了杨雄、李白,未闻可以为圣人,虽做了状元、宰相,未见可以称理学。"塾讲教学内容以程朱为学,因为朱子"集诸儒之大成","宗程朱即所以宗孔孟,宗孔孟即所以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也",而"同人又幸生朱子桑梓之邦,则熟读朱子之书、熟讲朱子之学,自是同人本分内事"。规约要求"同人乡塾讲书,必要阐明朱注,使朱子注义莫逆于心,然后孔、曾、思、孟之微言始有入路;由是而兼读《小学》、《近思录》、《太极图说》、《通书》、《西铭》诸书;由是而循环理会《六经》以及《纲目》、诸史,则天下之理皆可以一以贯之而无疑矣。""今同人相与讲求圣人之学,或在家塾受徒、或就他乡西席,皆当以教育英才为己任"。"教育之法,圣贤经书甚详,莫要于《小学》、《大学》二书","同人若能勇革世习,不为俗学夺志,悉遵《小学》、《大学》之法教训童蒙、培植后进,其所以诱掖激厉,又能循循有序,如此功深日久,必能养就一番英才,可以传圣人之学而为当世之大用者。"[26]

元代曾将程朱理学定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元史》卷八十一《选举一》记载,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清史稿·选举》载:"自唐以后,废选举之制,改用科目,历代相沿。而明则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谓之制艺。有清一沿明制,二百余年,虽有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举出身者相比。"所谓制艺,即用"四书""五经"的内容出题,让参试者作"八股文"。科举考试的重心是"四书",朱熹的《四书集注》和程颐、程颢、朱熹所注"五经"作为命题范围和考试内容,成为取士的标准。徽州私塾毫无二致地以科举为指归,注重经、史的教育及制艺的训练。

倪士毅撰《作义要诀》一卷,皆当时经义之体例,为徽州私塾制艺训练的龟鉴。"是书所论,虽规模浅狭,未究文章之本源,然如云第一要识得道理透彻,第二要识得经文本旨分晓,第三要识得古今治乱安危之大体;又云长而转换新意,不害其为长,短而曲折意尽,不害其为短,务高则多涉乎僻,欲新则类入乎怪;下字恶乎俗,而造作太过,则语涩,立新恶乎同,而搜索太甚,则理背;皆后来制艺之龟鉴也。国家设科取士,仍以经义为先。我皇上圣训谆谆,厘正文体。操觚之士,皆知以先正为步趋。"[27]

徽州人的观念是“儒为名高”,读书人的价值只有通过了科举考试才能实现。一旦入仕,既可光宗耀祖,又为他们的商业提供一个政治上的依靠。据《宋元明清徽州各县进士人数表》,明清两代徽州出了 618 名进士。[28]在培养科举人才上,徽州私塾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以治生为手段的职业教育读本

尽管徽州有着“业儒”的传统,但是一方面,由于每个人资质有异,希望家族子弟全部走科举入仕之路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出于生计的需求,每个家族必须保证有必要的经济来源。徽州山多田少,土地瘠薄,农业收入不足以自给,大部分的徽州人从事着农业以外的其他治生活动,比如行医、经商,以及各种各样的手工业劳作。徽州人在坚持以科举入仕为教育重点的同时,在以宗族为主体的私塾教育活动中特别重视培养子弟的治生能力,让同族子弟掌握一门熟练的技艺,为将来的谋生打下坚实的基础,加强对子弟的职业教育是徽州私塾教育的一大特点。

对于徽州人来说,如能“学而优则仕”,则谋求一代良相,也可“学而仁则医”,以求成为一代良医,悬壶济世是徽州人的职业首选。汪道昆在《医方考引》中曾说“吾郡贵医如贵儒”,行医是徽州人理想的职业选择。据目前不完全统计,自宋元至近代,新安地区有文献可考证的医家,有 1000 多位,明清时期几占九成。中医古代教育的主要形式是师承相授,包括师徒相授和家族相袭。徽州是封建宗族制度极为发达的地区,因而家族相袭构成了新安医家的一大特点。南宋歙县人张杲,字季明,其伯祖张扩受业于庞安时,祖张挥,父张师孟均业医,为新安第一代名医世家。张杲撰《医说》十卷,“采掇诸书,据其见闻所及为是编,凡分四十七门。前七门总叙古来名医、医书及针灸、诊视之类,次分杂证二十八门,次杂论六门,次妇人、小儿二门,次疮及五绝、痹疝三门,而以医功报应终焉。……取材既富,奇疾险证,颇足以资触发,而古之专门禁方,亦往往在焉。盖三世之医,渊源有自,固与道听涂说者殊矣。”[29]此书既是张挥、张师孟、张杲祖孙三代行医实践之总结,也是张氏一族医术传承的脉线。明汪机医术则是通过弟子的继承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汪机,字省之,祁门人。其幼读诗文,为邑之秀才,因母病呕吐久治不愈,遂究心医学,用古之秘方治疗母病,顿获痊愈。毕生行医四十余年,远近求诊,岁无虚日。撰《针灸问对》三卷、《外科理例》七卷附方一卷。陈桷,字惟宜,祁门人,学医于汪机,取汪机诸弟子所记汪机治疗效验裒为一集,编《石山医案》三卷。明江瓘编《名医类案》十二卷,其子应宿增补,他的医术由其子继承。明孙一奎,字文垣,休宁人。师从黟县黄古潭,后游历彭蠡、庐、浮、沅、湘、三吴等地,遍访名医,虚心求学,凡有所长,均往请益。撰《赤水玄珠》三十卷、《医旨绪余》二卷。这些医学著作既是新安医家长期从医活动之经验积累,又是他们传授子弟、学徒医术的教本。

商业活动计算为第一要务,算术能力的培养在明清徽州的私塾教育中也相

当重要。明清徽州的私塾教育不仅教以诵读、字画,而且还兼授算术。汪道昆就指出:“休(宁县)、歙(县),右贾左儒,直以九章当六籍。”[30]有程大位《算法统宗》十七卷。“此书专为珠算而作。其法皆适于民用,故世俗通行。”[31]将“算术”作为童蒙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应该说是徽州教育的特色。

注释:

〔1〕〔4〕赵汸:《商山书院学田记》,《东山存稿》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朱熹本贯徽州府婺源县永平乡松岩里,因父仕入闽,侨寓福建崇安五夫里,后居建阳考亭。朱熹虽出生于福建,但却一直视自己为新安(徽州)人。参见《朱熹年谱》附录一黄榦:《朝奉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

〔3〕李应乾:《茗州吴氏家典序》,吴翟:《茗州吴氏家典:卷首》,合肥:黄山书社,2006 年,第 3 页。

〔5〕〔6〕〔7〕〔8〕〔16〕〔23〕〔27〕〔29〕〔31〕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第 32、35、39、150 、1789、441、2755、1345、1417 页。

〔9〕汪克宽生平详见:《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一·汪克宽传》;程瞳:《新安学系录》卷十四《汪克宽传》。

〔10〕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1〕赵汸:《东山存稿》附录《东山赵先生汸行状》。

〔12〕朱熹:《答吴晦叔》,《朱文公文集》卷四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1914 页。

〔13〕朱熹:《题小学》,《朱文公文集》卷七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3671 页。

〔14〕朱熹:《论语训蒙口义序》,《朱文公文集》卷七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3614 页。

〔15〕吴觉在:《纯正蒙求原序》,胡炳文:《纯正蒙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陈栎:《论语训蒙口义自序》,《定宇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陈栎:《中庸口义自序》,《定宇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朱升:《小四书序》,《朱枫林集》卷四,刘尚恒校注,合肥:黄山书社,1992 年,第 51 页。

〔20〕涨潮:《蒙养诗教小引》,《昭代丛书:别集》,道光十三年刻本。

〔21〕石国柱、楼文钊、许承尧修纂:《民国歙县志》卷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277 页。

〔22〕胡渊:《蒙养诗教》,涨潮:《昭代丛书:别集》,道光十三年刻本。

〔24〕朱熹:《大学章句序》,《朱文公文集》卷七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

〔25〕朱熹:《经筵讲义》,《朱文公文集》卷一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691 页。

〔26〕施璜:《塾讲规约》,涨潮:《昭代丛书:甲集》卷七,道光十三年刻本。

〔28〕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92 页。

〔30〕汪道昆:《汪氏统宗谱》,《太函集》卷一一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责任编辑:陶　然〕